

导言 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在当今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真正将翻译研究纳入跨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则最早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事。在这方面，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的美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安德列·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所起到的开拓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¹ 这两位学者都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的，因此他们的翻译研究理论基点自然都是比较文学。而且与一般比较传统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关心文化研究的进展，并试图把狭隘的比较文学领地扩大到更为宽广的比较文化的范围。再加之这二人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 90 年代初来共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

1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有两个含义：广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 或 translation research）和狭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此处所讨论的翻译研究显然是后者。国际翻译理论界比较公认，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领域，其崛起之标志是于 1976 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位外还有比利时的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英国的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莫娜·贝克（Mona Baker）、丹麦的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美国的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修订版）

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1998）¹中提出了另一个全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这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惜他们在这方面并未能多作阐发，同时也由于他们自身知识的局限，也未能涉及范围更广的跨越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理论课题。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随着翻译领地的扩大和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再加之文化研究的一度受挫，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本导言权且借用“翻译转向”的本意，将其沿用至中文的和比较的语境来讨论，并将围绕翻译与文化以及这两个彼此互动的“转向”展开论述。

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学再建构

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一直在向弱小的民族和国家渗透。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人们为了实现与世界的交流和“接轨”，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学习英语。因而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如果他们都能直接用英语来进行彼此间的交流，将来还会需要翻译吗？翻译的功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将会自然消失吗？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情况果真如此，翻译的作用也没有被削弱，而且在将来也不会被削弱，相反，翻译已经在当前显示出而且仍将继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影响一样，全球化非但不可能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变得趋同，反而更加加

1 Bassnett, S. & Lefevere, A. 1988.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速了文化多元化的步伐，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便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和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丹麦学者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霍斯特·图尔克（Horst Turk）、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和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安德列·勒弗菲尔、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等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著述颇多，并且提出了不少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洞见。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往往将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的研究者群体称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学派，至少不能算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共同纲领的学派，而是一种发展的趋向或潮流。围绕这一潮流和趋向，一批大体志同道合的学者在一起切磋讨论，无形中仿佛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研究群体。当然，加入到这一潮流的学者的名单是不确定的，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大。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影响。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圈外人”的兴趣，从而使得翻译研究的疆界也在大大地扩展。我们从这些来自圈外的学者的著述中很难见到以往的传统翻译研究学者所使用的那套术语，而是不断地见到一些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新的术语。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翻译研究者便因此拍案而起，试图捍卫传统的翻译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这种善良的本意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信息时代，翻译本身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学科如果要保持旺盛的活力，就必须不断更新方法和理念，以适应变动不居的时代需要。这样看来，如果翻译研究仍像过去那样仅仅吸引少数专家的注意，那它就永远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境地。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伪翻译”或“译述”或“改写”的东西，也许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修订版）

这究竟之于我们这个学科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现在就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也许读者通过本书各章节的论述自然会得出令人信服结论。

诚然，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确实为我们中国学者从跨东西方比较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同时也为我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进一步深入研究翻译问题和翻译现象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但上述学者除去欧阳桢作为出生在中国的汉学家而精通中国语言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和案例大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语境，或者依赖翻译的中介，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当然，上述学者中有不少都曾对包括中国语言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有着一定的兴趣，有的甚至还花费了很多时间学习中文，但是事实是，即使对土生土长的中国学者来说，要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也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努力的过程。正因如此，与国际翻译学术界在近四十年内的发展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或停留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层面，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至今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¹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速度大大地加快了。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从事中西翻译研究或文化研究，没有中国文化的知识或中国语言的造诣至少是不全面的。鉴于目前翻译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拘泥于狭窄的语言字面的困境，从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无疑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一方面能弥补国内此方面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

1 在中国的语境下，也许是由于翻译学本身的地位，大多数翻译研究者用中文发表论文的阵地主要是《中国翻译》以及一些外语类的刊物。值得庆幸的是，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和《文艺研究》在内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性学术期刊近几年也开始发表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了，虽然大都是广义的文化翻译方面的论文。

以促使我们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卓有成效的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¹ 通过这样的讨论和对话，最终对从西方文化语境中抽象出的翻译理论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翻译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既然我们坚持文化翻译的立场，² 我认为，从文化的维度来考察全球化在翻译领域内的影响和作用，就应该将语言当作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而考察翻译则正是将语言学的经验研究和文化学的人文阐释及翻译文本的个案分析结合起来的有效尝试，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翻译学这一新兴的尚不成熟的边缘学科的理论建构。如上所述，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翻译的定义也应该发生变化。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在这方面，我和许多东西方学术界的同行一直在呼吁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翻译学的诞生和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第 1 章予以阐述，此处毋庸赘言。我认为，既然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不可分，那么翻译无疑便充当了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因而对翻译的研究也应该摆脱狭窄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将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具有对其他学科的普遍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由此可见，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便是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

1 尽管本书初版写于 21 世纪头一个十年里，但是如今国际翻译研究界中国学者的作用确实令人震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研究顶尖刊物（如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abel*, *Target*, *META*, *Translation Studies* 等）中见到中国学者的文章，有时甚至整期都由某一位中国学者担任客座编辑（包括我本人在内）。可见，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已经开始注重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了。

2 关于文化翻译方面的英文著述，可参阅 Wang, N. 2004.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修订版）

能动性阐释和再现)。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在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时更是如此。在这方面看来,巴斯耐特和勒弗菲尔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而他们将翻译看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实际上也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铺平了道路。确实,翻译研究的兴衰无疑与文化研究的地位如何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文化研究出现“危机”症状时,呼吁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就是势在必行的了。因为翻译至少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文化研究现存的英语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局限,为一种真正的多元文化格局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再者,跨文化的翻译研究也给文化研究学者带来了跨文化的视角,使他们走出“英语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的语境。

诚然,作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者,我们首先应该立足中国的文化土壤,考察翻译对于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任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文化翻译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和影响深远的历史,它始自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对外来文化的大面积翻译和介绍,或者甚至更早。因而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必然会想到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在历史进程以及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或者说就是一部外国文学的翻译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被翻译成中文,使得汉语变得“欧化”和大大地不纯了。尽管我们从今天的“忠实”之角度,完全可以对“五四”先驱者们的许多在语言层面上显然是不忠实的,有些甚至从另一种语言转译

的译著进行挑剔，但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些“翻译”文本所产生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当然，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语言的“欧化”和中国文学话语的“丧失”。平心而论，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这种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灵感的来源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¹当然，鲁迅因为这番表述后来成了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被看成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则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翻译体的”“混杂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体系，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由于它与其先辈的巨大差异和与西方文学的天然区别，这种现代文学话语体系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与西方的文化现代性进行对话。这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消解了单一的现代性（singular modernity）的神话，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他种”（alternative）现代性，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铺平了道路。²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应该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进而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应当被看作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可算作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尤其在涉及文学翻译时就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

1 鲁迅. 198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512.

2 关于有选择的“他种现代性”的具体论述，可参阅 Liu, K. (刘康). 1998. Is there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debate about modernity in China. In Jameson, F. & M.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64–188.; 最近的一篇有中译文的文章: 阿里夫·德里克. 2007. 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南京大学学报, (6): 50–59.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修订版）

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变为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transform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是以语言为其主要媒介而实现的。

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和争鸣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¹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此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以及与翻译研究的互动关系之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本导言所讨论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但是若追溯其更早的渊源，则可从F. R. 利维斯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现因子，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²如果沿用巴斯耐特和勒弗菲尔所描述的狭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之定义，后者则起源于1976年的比利时鲁汶会议。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大大早于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较之翻译研究更为成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此早期的翻译研究理论家呼吁一

1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虽然不多，但可以参阅下列两种：Wang, N. 2003.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uropean Review* 11(2): 183–191; Tao, D. & Jin, Y. (eds). 2005.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 关于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崛起以及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发展概况，参阅：陆扬. 2008. 文化研究概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种“文化转向”就有着某种理论和方法论的导向作用。实际上，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虽然早期的文化研究者并没有将翻译研究纳入其视野，但随着翻译研究本身的深入和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愈益明显，到了9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文化研究的传媒研究之范畴，吸引了众多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当文化的翻译已经越来越显得重要时，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研究翻译便自然形成了翻译研究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尤其是用于文学的翻译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和再现就更是如此。

我们说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这一点与翻译研究的“边缘性”、对传统的学科体系的反叛和对原文文本的“创造性叛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以及美国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过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兴盛，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这就更与文化研究的“反美学”特征相悖。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或试图将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跨）文化语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修订版）

境下来考察和研究。这当然是可行的，而且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效。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并非全然对立，而是有着某种互补作用。¹ 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中专门讨论。

现在再来看看翻译研究的现状。和文化研究一样，翻译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这既是它的弱势，同时也是其强项：它不被既定的学科建制所认可，但却可以游刃于多门学科之间；它在欧美的名牌大学长期以来甚至没有生存之地，而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三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² 但是它的跨学科性和边缘性却赋予它同时可以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进行对话。也就是说，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学科建制内从事翻译研究。他们也完全可以跨越本学科的界限，涉及范围更广泛的文化现象。此外，也和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情况一样，最近二十多年来，一批世界一流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如雅克·德

-
- 1 应该指出的是，有的学者，如荷兰的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甚至提出一个新的范式——“文化学”（Cultural Sciences），试图以此来弥补文化研究在学科意义上的不足。参见佛克马 2005 年 6 月 10 日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文化研究与文化科学》（*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Sciences*）。
 - 2 确实，在牛津、剑桥以及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翻译学科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而在中国的高校，翻译学不是被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二级学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之下，就是被放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下来研究，它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类似“文体学”“英国现代戏剧”“美国南方文学研究”等研究方向的三级学科。但最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转机：由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中国清华大学共同发起并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翻译现代主义，翻译理论，翻译文化”（*Translating Modernism, Translating Theory, and Translating Culture*）于 2008 年 5 月率先在剑桥举行首次研讨会，2009 年 9 月在耶鲁举行第二次研讨会，2009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第三次研讨会。在这里，翻译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大大地拓展为一种文化传达（*cultural transmission*）和文化转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中国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于 2007 年设立了翻译专业学位学科评议组，其审批的硕士学位等同于工商管理硕士（MBA），一些高校也相继建立了翻译学院或翻译系。